

中国书画
鉴定与研究

王连起
卷
(上)

故宫出版社

中国书画鉴定与研究

王连起卷(上)

故宫出版社

目 录

- 赵孟頫《道教碑》真伪考 \ 4
- 赵孟頫临跋《兰亭序》考 \ 24
- 谈《三希堂法帖》所刻赵孟頫书 \ 64
- 一件被误定为陈修所书的欧阳修尺牋 \ 84
- 赵孟頫《天冠山诗帖》考辨 \ 88
- 《快雪堂法书》帖考 \ 96
- 俞和及其行书《兰亭记》 \ 126
- 赵孟頫伪书丛考 \ 138
- 文徵明《临赵松雪兰石图》考——兼谈文氏兰竹题材绘画 \ 158
- 赵孟頫及其书法艺术简论 \ 168
- 赵孟頫《国宾山长帖》考——兼评赵孟頫款《苏轼古诗帖》 \ 218
- 赵孟頫书画真伪的鉴考问题 \ 226
- 鲜于枢生卒事迹考略 \ 280
- 元《乐善堂帖》考略 \ 300
- 元黄滔《六月十一日帖》考 \ 312
- 赵孟頫行书《洛神赋》真伪鉴考 \ 318
- 宋人《睢阳五老图》考 \ 338
- 元《张雨、杨维桢、文信诗文》卷及相关问题考略 \ 362
- 元人书《武林胜集》卷考 \ 386
- 从董其昌的题跋看他的书画鉴定 \ 398

中国书画鉴定与研究

王连起卷(上)

故宫出版社

目 录

- 赵孟頫《道教碑》真伪考 \ 4
- 赵孟頫临跋《兰亭序》考 \ 24
- 谈《三希堂法帖》所刻赵孟頫书 \ 64
- 一件被误定为陈修所书的欧阳修尺牘 \ 84
- 赵孟頫《天冠山诗帖》考辨 \ 88
- 《快雪堂法书》帖考 \ 96
- 俞和及其行书《兰亭记》 \ 126
- 赵孟頫伪书丛考 \ 138
- 文徵明《临赵松雪兰石图》考——兼谈文氏兰竹题材绘画 \ 158
- 赵孟頫及其书法艺术简论 \ 168
- 赵孟頫《国宾山长帖》考——兼评赵孟頫款《苏轼古诗帖》 \ 218
- 赵孟頫书画真伪的鉴考问题 \ 226
- 鲜于枢生卒事迹考略 \ 280
- 元《乐善堂帖》考略 \ 300
- 元黄溍《六月十一日帖》考 \ 312
- 赵孟頫行书《洛神赋》真伪鉴考 \ 318
- 宋人《睢阳五老图》考 \ 338
- 元《张雨、杨维桢、文信诗文》卷及相关问题考略 \ 362
- 元人书《武林胜集》卷考 \ 386
- 从董其昌的题跋看他的书画鉴定 \ 398



赵孟頫《道教碑》真伪考

传世元代赵孟頫奉敕撰文并书的《元道士张留孙碑》，全名“大元敕赐开府仪同三司上卿辅成赞化保运玄教大宗师志道弘教冲玄仁靖大真人张公碑”，即《道教碑》。此碑有两个：一在北京东岳庙，天历二年（1329年）立，人称北道教或北碑；一在江西贵溪龙虎山，至正四年（1344年）立，人称南道教或南碑。两碑都很高大雄伟，碑文约两千八百余字。赵书碑中如此长篇巨制的几乎是仅见。一些鉴赏家、金石学家对此碑评价很高，很多学赵书的人也都临写过此碑。但是，同一内容同一作者的碑有两个，立碑的时间又都在作者死后多年，这就容易引起人们的怀疑，前人已曾提出了不少问题。历来赞扬者有，怀疑者有，否定者也有。孰是孰非，迄无定论。今本人不揣简陋，试对此碑作一详细鉴考，以求正于专家和读者。

下面我们首先看看前人肯定、赞赏此碑的评论。

《道教碑》之所以负盛名，一大原因是孙退谷曾给予很高评价。《庚子销夏记》卷七云：

元道士张留孙，官加开府仪同三司、上卿。名器之滥，至此可笑也。赵文敏奉敕书，其碑丰伟秀拔，最称巨观，自徐季海、李北海而后，未见其匹敌也。碑刻两面，今岿然矗立东岳庙中。石理坚致，丝毫不坏。刻者为茅绍之。彼时求公书者，非茅刻则不书。观其摹勒之妙，固名手也。

孙是清初很有影响的鉴藏家，他的鉴赏意见，颇为当时和以后的人所崇信。对赵孟頫推崇备至并高度评价此碑的，还有清末的叶昌炽，他说：

至赵文敏出，重规叠矩，鸿朗庄严，奄有登善、北海、平原之胜，有元一代丰碑皆出其手。前贤谓韩文起八代之衰，余谓赵书亦起两宋之衰。溯其生平，洊历五朝，年登大耋，自至元以迄至治，所书碑版，照耀四裔。同年李木斋府丞尝专辑赵碑为一目，哀然成帙。余先后搜罗亦不下五十通。童时见举子学书，皆习重阳宫御服碑，不知此碑但以姿胜，未为杰构。鸥波墨妙，自以许熙载、张留孙两碑为正矩。^[1]

他比孙退谷更进一步，对赵孟頫在书法史上的地位，给予了最充分的肯定。《道教碑》之外，他还举出一个《许熙载神道碑》，后面我们在论证赵碑真伪时，也要谈到此碑。但叶昌炽所赞的《道教碑》，没有指明是北碑还是南碑，有些语焉不详。

朱剑心《金石学》第三编“说石”，说到元碑时，给了回答：

至赵孟頫出，重规叠矩，鸿朗庄严，奄有颜、李之长，有元一代丰碑，皆出其手，可谓起两宋之衰矣。其所书碑版、杂文，照耀四裔。见于孙氏著录者，即有

[1] 清·叶昌炽《语石》卷一《元四则》。

一百余通。其最精者，如追封鲁郡公《许熙载神道碑》（欧阳玄撰，正书，至元四年八月，河南安阳），上卿玄教大宗师《张留孙碑》（撰文并正书至正四年，江西贵溪），为书学正矩。

他也是张、许二碑并颂，其措词造句几乎都一样！所不同的是他将二碑立碑年代都注出来了：《许公碑》至元（后）四年（1338年），《道教碑》（南碑）至正四年（1344年）。赵孟頫卒于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六月十五日。也就是说：一碑立于他卒后16年，一碑立于他卒后22年。

肯定《道教碑》的人中，在北碑、南碑的真伪优劣问题上，也有两种对立的意见。概括地说，肯定北碑的一派认为北碑比南碑立的时间早；肯定南碑的则认为南碑书法优于北碑。这些问题我们也留在后面来谈。下面我们再看否定者、怀疑者的议论。

首先发难的是清代的陆心源。《仪顾堂题跋》卷十五，跋《道教碑》：

右《张留孙碑》，至治壬戌赵文敏奉敕撰，并书丹、篆额。案文敏行状：卒于是年六月辛巳。据碑：留孙卒于至治元年十二月壬子，明年三月弟子七十五人归其丧于故山。仁宗乃命吴全节嗣封，予告治丧，命子昂著文。是碑之作当在至治二年四、五月间，去子昂之卒仅一月余耳。《松雪斋集》及《松雪外集》，文之为僧道作者甚多，独不收留孙碑，恐文与字皆仲穆代笔，故字与《湖州府治碑》绝类。不然，煌煌大篇，刻集时反遗之耶？行状称：至治壬戌春，遣使传旨俾书《孝经》而未及。奉敕撰碑事，岂以方外而讳之欤？恐亦未必然也。天历二年五月立石，去子昂之卒七年矣。

陆心源是很有见解的，他指出了几个重要问题：一、从张留孙治丧时间，推论出写碑距赵之死只有月余时间。二、指出赵的集子里并非不收为僧道所作的文章，但无此《道教碑》。三、曾传旨命赵书《孝经》而未能写。四、认为书法与《湖州府治碑》相类似，因而怀疑是其子赵雍（仲穆）代笔。代笔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没有怀疑，就是“奉

敕”问题。

近代的欧阳辅对道教碑谈得最多。《集古求真》卷六“真书四·论北碑”：

《玄教大宗师张留孙碑》，赵孟頫书并撰，在北京东岳庙。两面刻，各二十八行，行六十字。无甚剥落，惟末行吴全节结衔，集贤院之“集”字不可见。碑为天历二年立，距文敏之卒已七年。故陆心源疑为仲穆书而冒乃翁之名。然为奉敕撰书，则已卒之后安有奉敕之理？殆生时所书，至是始刻耳。

他很迷信“奉敕”，所以对陆心源提出的怀疑不以为然。认为是“生时所书，至是始刻”，是真的。接下去又谈南碑：

赵孟頫书并撰，在江西贵溪县龙虎山，与北京本无异。石尤高大，亦两面刻，三十五行，行七十五字，阴面二十五行，亦七十五字。正面上半横断一道，四行至八行各缺六、七字，其余诸行各缺一、二字。下面斜断一道，其缺廿余字，右下缺一角，失去数字。阴面上断，每行损一、二字。下断中间剥落一片，其缺三十余字。下角所失亦数字。文后空两行，末行题王景平、张尚彬监役，龙虎张纯摹刻，尾题至正四年，而仍有吴全节立石等字，后于天历又十七年。行字疏朗，似非从北京本摹出，然校其字画，实同出一源，钩手不同耳。北京本为茅绍之所镌，宜最精善，今对勘之，似反不如江西本之清拔。窃意北京本或系翻摹，非绍之原刻，故石尚比江西本为完好，而字则不称，若茅氏原刻，当非无名之张纯所能胜。

欧阳辅云“与北京本无异”，其实是有异的，北碑豪杰的“傑”，无“亻”旁。南碑张留孙弟子比北碑多邓光宇、于大易等十来人的名字。南碑碑底刻有方格，北碑没有。欧阳辅称南碑刻手为“无名之张纯”。按元代虞集有与张纯论刻碑的《篆刻说赠张纯》，张当是懂书法的刻碑高手。未闻其

名，非其无名。欧阳辅在这里又认为南北之本同出一源，面貌有异是钩手不同所致，与论北碑时“至是始刻耳”之断不同，又怀疑北碑“或系翻摹，非绍之原刻”了。

他在谈到《玄教宗传碑》时，又谈起了《道教碑》：

（南碑）为至治二年三月奉敕，至六月文敏即下世。故细审其文，尚似鸥波遗墨，而其书殊不副，以为仲穆代笔，理或然欤？

他再次提到“奉敕”，但却认为书法不符了，对是否赵雍代笔也犹豫起来。在《集古求真续编》中，他再次谈《道教碑》：

碑文云留孙卒于至治元年十二月，弟子七十五人送其丧归，仁宗乃命吴全节嗣封，又命子昂作文。当在二年二、三月矣，距子昂之卒不过两月余耳。《松雪斋集》为释道而作之文甚多，独此文不存。故陆心源以为此文与书皆仲穆代笔，故其笔法与仲穆所书《湖州县治碑》绝相类。余谓陆氏之言恐非笃论。奉敕撰书，固不敢延迟，即一月之内，亦当应命，未必为仲穆所代。仲穆书法，本学其父而能具体者也。北京本颇似仲穆，盖复刻所致，若贵溪本，则非仲穆所能及也。

因为对“奉敕”问题深信不疑，所以他对代笔问题又否定了。欧阳辅的这几段议论，都没有出陆心源谈到的范围，而且看法反复不定，以他最后一段为准，还是肯定了南碑。

近代已故书画家、收藏家石雪居士徐宗浩先生，跋《道教碑》（北碑）^[2]云：

《张真人碑》，文敏公至治二年奉敕撰、书。其时公已在里，且病甚，故文中云：先帝弃群臣，老臣伏在田里，且三年矣。公以延祐六年南还，至至治二年适为三年。先帝指仁宗。文敏卒于二年六月，真人葬于三月，即书此碑应在二年四、五月间。彼时既病不能与，不应再作如此庄书，

[2] 徐宗浩跋《道教碑》，现藏故宫博物院。

而笔意气韵且多不类，断为吴全节代笔。世之论文敏者，曰算子、奴书，曰柔媚，大都误于此碑。若公之《玄妙观三门记》《湖州妙严寺记》《昆山淮云院记》《松江宝云寺》等碑，精妙之笔，惜未之见也。书虽小道，而名之成否亦大有关系。或草草应付，或请人代笔，倘竟为其所误，亦殊可惜。孙退谷素号精鉴，乃谓此碑“丰伟秀拔，最称巨观，自徐季海、李北海而后，未见匹敌”。真鉴之难，良可慨也。

徐老先生书学松雪，收藏赵书墨迹、拓本颇多，对赵孟頫很有研究。他的见解很受当代书法研究者的重视，潘伯鹰《中国书法简论》“途径示范”部分也提到：

徐君石雪云：“学赵书者多摹仿北京《道教碑》，不知此碑非子昂所写，因为元朝敕令子昂写斯碑时，子昂已卧病不能握笔，乃令其徒吴全节代笔。未几，子昂死。吴全节书不逮子昂远甚也。”

两段议论，都认为是奉敕所书，都提出了代笔问题。虽然陆、欧也谈到这两个问题，但对代笔人却没有说得这么明确：“子昂已卧病不能握笔，乃令其徒吴全节代笔。”即是说当时吴全节就在松雪之侧，随时可以给松雪代笔。并且他还是松雪的弟子。这么肯定的语气，难怪很多人都深信不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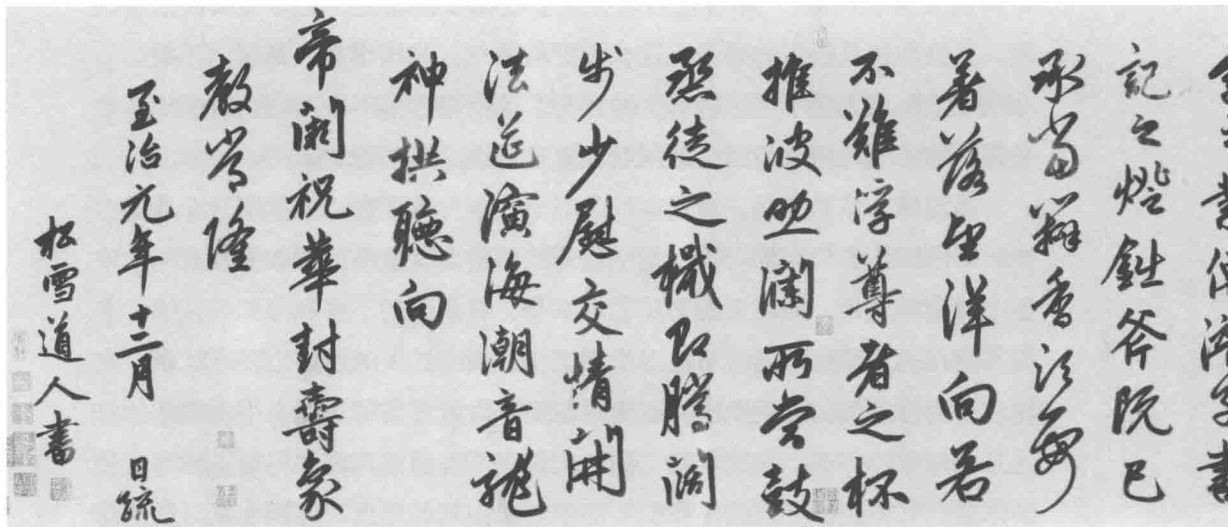
以上是前人关于《道教碑》的评论。确实提出了不少问题，有些见解也是很有价值的。结合所提出的问题，现在谈谈个人的看法。

鉴定碑、帖的真伪，最根本的是对书法本身的辨别。要鉴别一个人的书法，必须对作者的用笔习性、结字和章法的特点、学书的师承关系及一生中各个时期的变化，即其人的书法艺术本身，有全面的了解和深刻的认识，掌握其内在的规律性。同时对仿、学甚至伪造其书的人的作品也要有认识、有比较，透过貌似而看到质别。赵孟頫留下了大量可靠的真迹，中、晚年的作品几乎每年的都有。认真观察，细心比较，不迷信前人，如再加上临写实践的体会，其书法特点就能在我们头脑中形成深刻的概念。提到他某时期的作品，真迹的风格面貌便会映现在我们的脑海。当然，这只是对赵孟頫而言如

此，对其他只留下少数真迹的古代书家又当别论。

松雪晚年的真迹，中、大字行楷书有：《帝师胆巴碑》，延祐三年（1316年）。《归去来辞》，延祐五年（1318年）。《仇锸墓志铭》（图1），延祐六年（1319年）。《杭州福神观记》，延祐七年（1320年）。《光福寺塔铭》（图2），至治元年（1321年）二月。《方外交疏》（图3），至治元年（1321年）十二月。这是他六十三岁至六十八岁的部分代表性作品。虽然用笔一丝不苟，却是富于变化。结字循规蹈矩，而能潇洒自如。每字中宫收的很紧，也毫无窘迫拘束之态。笔画较皇庆以前更加放纵苍劲，但绝不浮滑轻飘。起止转折，牵丝搭笔，笔力深沉扎实，指腕虚和灵动。所谓人书俱老，书法艺术水平是极高的。而《道教碑》，无论北碑（图4）和南碑（图5），却是用笔单调，结体松散，拘谨做作，显得气虚力弱，筋疲骨软，十分俗气。且不说与笔笔提起、字字精神的《帝师胆巴碑》《仇锸墓志铭》无法比拟，就是与至治元年（1321年）的《光福寺塔铭》《方外交疏》相比，也有虎狗之差。虽然这后两件作品已不是那样精到严谨，可以明显看出有些力不从心，但俊气、韵味和力量还是在的。所以，此碑非赵松雪所书是可以肯定的。

也许有人说，以上所举都是墨迹，刻本总有些两样。是的，刻手再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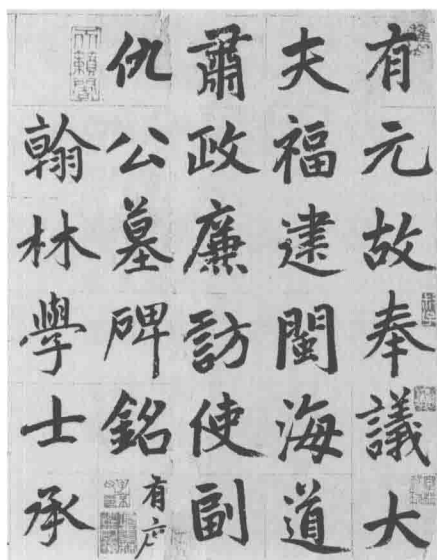


图1 赵孟頫《仇鐸墓志銘》卷局部
日本阳明文库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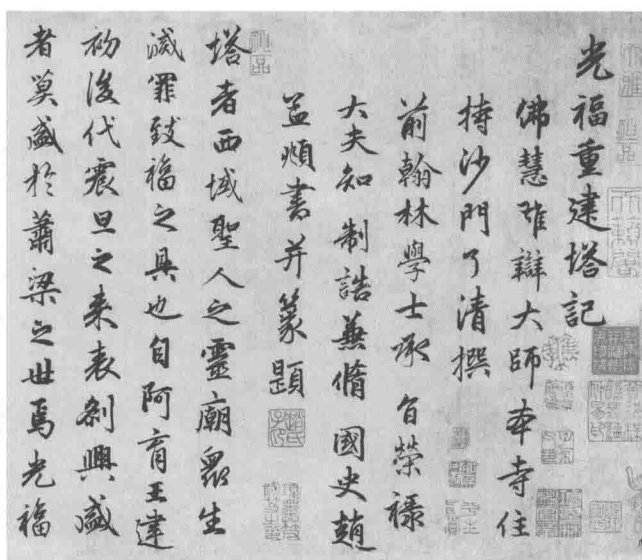


图2 赵孟頫《光福寺塔銘》卷局部 上海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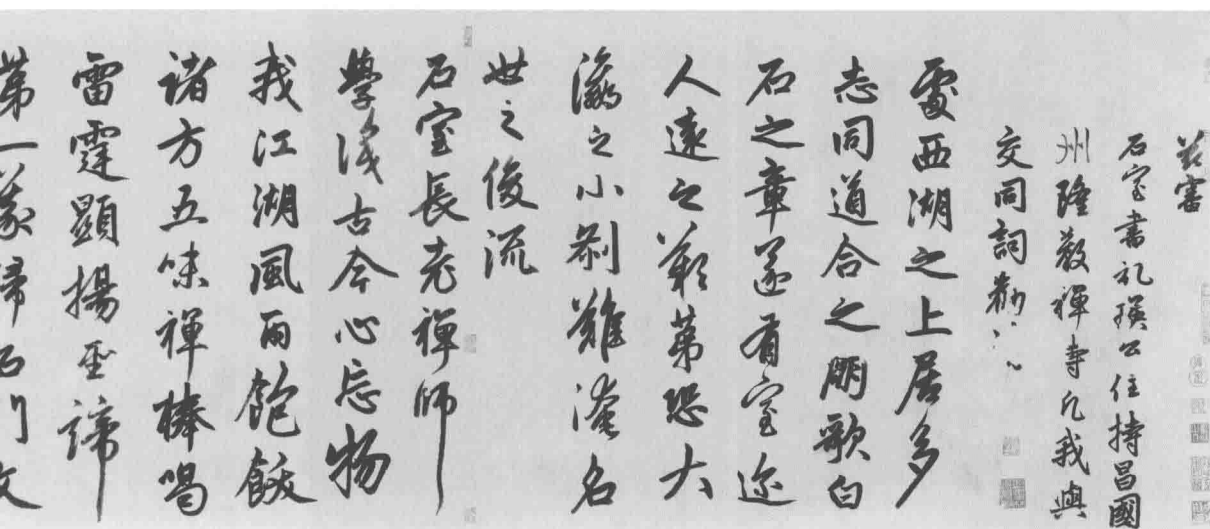


图3 赵孟頫《為隆教禪寺石室長老疏》（《方外交疏》）卷 天津博物館藏



图4 赵孟頫款《道教碑》北碑局部 私人收藏



图5 赵孟頫款《道教碑》南碑局部 私人收藏

摹勒之后也总要有些失真。况且刻本与墨迹呈现的视觉效果也有所不同。但是，“画影图形”，规模总还要像的。米南宫、黄伯思鉴别《淳化阁帖》中的伪帖，根据也并非全是墨迹。不少的碑、帖拓本与它们的底本墨迹同存于世，明眼者一见便知哪个墨迹是哪个刻本的底本。比如赵孟頫的《兰亭》十三跋，虽然墨迹与刻本都有伪品，但知赵者却能指出真的刻本只有快雪堂刻，它的底本真迹是独孤本《兰亭》火烧残卷。不存墨迹的真碑，也是可以确定的，比如松雪所书的《珊瑚公碑》（也是茅绍之刻）明显是真品，而且能推断出它的书写年代——至大二年至三年之间（1309—1310年）。因为它的书法风格特点与同时的《昆山淮云院记》《湖州妙严寺记》完全一致。顺便指出，至大之后，松雪书的风格面貌又有了很大变化。简单说就是在刻意学王（羲之）的基础上，又吸收了李邕、柳公权的一些特点，更苍劲放纵了。因此，要鉴别他晚年作品的真伪，是不能以徐石雪先生所举的至大以前的作品作标准的。

书法上鉴别了真伪，问题是否完全解决了呢？还没有。因为前面所录的那些鉴赏家截然不同的评价，也都是他们根据各自对此碑的鉴定而作的。因此，还必须对他们提出的问题和论据进行分析，作出更充分更确切的论证。

陆心源、欧阳辅和徐宗浩都提到了“奉敕”与赵孟頫之死的时间问题。从虞集所撰的《张宗师墓志铭》（《道园学古录》卷五十、《道园全集》卷四十三）中我们知道，张留孙确切的归丧时间是至治二年（1322年）三月辛未（四日）。假设真有敕命给赵孟頫，他何时接到敕书呢？至大三年（1310年）八月他应诏赴京，在途中船上十三跋独孤本定武《兰亭》，历三十二日，即九月五日至十月七日。但他十月十九日才到大都。清代缪曰藻所撰《寓意录》录有松雪《唐律十五首》墨迹，后面其弟赵子俊跋亦云：“延祐四年秋八月，仆自吴兴迄北，小子玠从。舟行四十日，至十月初抵都。”从当时这些来往的路程时间看，敕书到吴兴，起码要在四月中下旬，甚至五月初。六月辛巳（十五日），松雪逝世。这之间，确实只有“一月余耳”。从他晚年书札墨迹中我们知道，管夫人卒后，他就“为老病所缠，眠食日减，略无佳况”（《与中峰札》，《赵氏一门法书》中）。“两目昏暗，寻丈间不辨人物，足胫疲痺，行步艰难”（《与进之札》，《元赵孟頫七札》中）。病情如此严重，是不能写这样的长篇大字巨碑的。陆心源提到“至治壬戌春，

遣使传旨俾书《孝经》而未及”。这是杨载所撰的赵孟頫行状中的记载，但陆心源记错了年代，应当是“至治辛酉春”。这个时候就因病不能“奉敕”了，一年以后，朝廷怎么会又降敕给病情更加严重的松雪呢？“壬戌春遣使存问，赐上尊酒、衣二称”，那是知其老病而加以慰问。我们现在见到的最晚有年款的真迹，就是至治元年（1321年）十二月的《方外交疏》。

陆心源、徐石雪都提到代笔问题，陆认为此碑是赵雍代笔，儿子代老子。徐认为是吴全节代笔，弟子代老师。代笔，前提是本人授意。陆心源的论据是《道教碑》与赵雍所书的《湖州府治碑》（图6）绝相似。欧阳辅不同意，他说赵雍是学其父具体而微者，言下之意，《府治碑》与《道教碑》相似是应该的。但他并没有对二碑进行比较，《集古求真》未录《府治碑》，他是否见过此碑，不得而知。我们将《府治碑》与《道教碑》作一比较，却见并不像：《府治碑》结体方阔，似学其翁中年（五十岁以前）之书，如《萧山大成殿记》《三门记》等。虽乏松雪之灵秀，用笔结字却扎实稳妥，笔画也自然流畅，毫无《道教碑》的窘迫疲俗之气。除《府治碑》外，赵雍还有其他碑刻特别是墨迹存世（图7），也都与《道教碑》毫无共同之处。

